

皮克提现象与日本的现实：“分配政治”的偏重和经济增长政策下的贫困

小岛明（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、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）

被称为“摇滚明星经济学家”的巴黎经济学院教授，法国人托马斯·皮克提，在日本引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轰动。他那本最受瞩目的著作《二十一世纪资本论》的日文版一经出版，不到几周的时间就卖出了十几万部。在如今出版行业相当低迷的现状下，发行此译著的出版社可谓受到了无数羡慕的目光。该书关注的主题是“贫富差距”。在原本就对贫富差距加剧争议甚多的日本，国会的经济政策讨论中，“贫富差距”就是一个激烈的论点。

不挣钱的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萎靡

然而，日本的实际情况有异于皮克提教授的观点，也可以说是日本独有的现象。泡沫经济结束后，仅就1990年代之后来看，资本削弱了企业的“挣钱能力”。曾经作为出口的中坚产业，又是日本经济领头羊的电子产业，在2000年以26兆日元触顶后一路下滑，现在只有大概11兆日元的水平。贸易收支竟然出现赤字。在日本，“资本”的“挣钱能力”的提升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对于产业整体来说“挣钱能力”的恢复和强化也是重要的课题。

从法人税收（国家的一般会计部分）的数据推移来看便一目了然。在泡沫经济鼎盛时期，1989年度法人税收高达16兆日元，而2014年度预计仅有10兆日元。虽然有各种特例措施，但上缴法人税的上市企业仅占3~4成。

皮克提所指的“资本”是指国债、股票、公司债券等有偿证券，以及银行存款、土地、房屋等包括不动产在内的概念。与其称之为“资本”，叫“资产”可能更为合适。一些家电生产商等为了确保收益平衡会将不动产、工厂等资产变卖，使账面数字好看，但这样获得的收益并不是通过“资本”挣来的。

日本现在面临的课题正是“资本”挣钱能力的恢复和收益率的提高。另外，所得的



小岛明（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、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）

差距加剧也是一个问题。最近这种差距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是正式雇用和非正式雇佣之间所得差距，以及在其过程中“雇用身份分类化”状况的产生。另外还包括不同年代人群间的负担差距，老年人群内部的收入差距等问题。这些都可以说是日本特有的问题。

尤其是非正式雇用和正式雇用之间的所得差距十分之大。特别是比正式雇用薪资少5~6成的非正式雇用的比例，在金融危机愈加明显的1998年后急剧增大，在企业正式开始进行被称为结构调整的裁员中，所得差距开始加大。直到不久前，很多工会还只是关心正式雇用的工会成员，而对非正式雇用者的问题并不过问。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指出，近年来日本长期雇佣制度已经形成了一种“既得利益权利”化的现状，建议应该调整制定一种更为灵活的雇佣制度和常规。雇佣和所得的差距既是企业管理上的问题，也同样是工会的问题。

股价伴随安倍经济学的登场而有所上升，但个人的股票持有率却呈下降趋势，2013年已降低到20%以下，为18.7%。而与此呈对比的是外国投资家的股票持有率却5年持续攀升，超过30%。买卖交易中的外国投资家比例高达70%。而存款与国债都以几乎为0的利率创下了收益率新低。

企业现在最需要的，大概要数企业家精神了吧。也正是应为如此，政府的“经济增长战略”（安倍经济学中的“第三支箭”）中反复强调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性。减少雇佣，上调所得较少的非正式雇佣人数比例，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确保利益的做法完全没有企业家精神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也指出，日本企业的内部持有资金相对股票市值的比率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（G7）中明显过高。该组织甚至号召“日本企业不要把资金握在手里，要善于运用！”（IMF日本经济审查，2014年7月）

要在“重视分配的政治”与“经济增长的政治”中取得平衡

二战后的高度经济成长期中，以结论而言，贫富差距是缩小了的。这其中，与分配政治的作用也有密切关系。战后，日本曾制定若干以“均衡的国家发展”为标语的经济计划。“均衡”即“没有贫富差距”。在“取消大城市与地方间的贫富差距”这样的口号下，将公共事业资源分配偏向地方的政策出台。政治上，“一票中的不平等”问题带来的教训也使地方优先的分配政策逐渐展开。

“成长”并没有在经济学上受到轻视。但是，在发达国家，马克思经济学在日本的经济学界至今有着很重的分量，因为日本一直都十分重视分配问题。实际政策方面，在所谓的经济赶超时期，是带有若干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色彩的，以便将资源向中央集中，有效地实现工业化。这种做法在经济赶超时代确实发挥了作用，确保了经济的成长和产业的发展。最后，虽然政治重心向“分配”转移，但并没有以经济成长作为牺牲。因为用来分配的蛋糕，即经济成长的成果已经足够大到可以兼顾成长和分配了。

然而，这种创造高增长率的经济赶超过程在1980年左右进入尾声。之后，到今天我们还未能筑起后赶超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型。1998年以后的通货紧缩使得经济不断缩小。

可以用来分配的蛋糕已经为负了。

2013 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（GDP）虽较前一年度增加了 1.8%，但仅为 483 兆日元，不及 20 年前即 1993 年（489 兆日元）的水平。对于日本来说，应该作为问题来重视的还有一个差距，即日本和海外各国之间经济成长率的差距，国际竞争力的差距（低下）。

如果将 1993 年世界各国的 GDP 以 100 来计算的话，那么 2013 年中国的 GDP 为 1609.8，韩国 447.8，美国 244.2，而日本却只有 97.4。全世界 GDP 中日本的份额当然也在减少，在 1990 年还占据 13.8%，而到 2013 年就只占 6.6%了。

如果不确保经济成长而一味执行重视分配的政策，最终将迎来一个“人人平等但人人贫困”的社会。也有可能贫富差距停止扩大，但社会整体进入贫困化状态。

虽然也有意见指出，由于人口在减少，所以不应该看 GDP 总额而应该关注人均 GDP。的确是这样的。但是人均 GDP 在各国比较的排名中也在大幅下降。

IMF 的资料显示，日本的人均 GDP 在 2000 年位居世界第 3，到了 2010 年降至第 16 名，而 2014 年又继续滑落到第 26 名。日元贬值和美元升值更加剧了这一排名的下滑。

“差距”与“差距感”之间的差距

在讨论贫富差距问题时，如何区分实际的差距和差距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高度经济成长期，所谓的经济增长期待值很高，人们对于收入增加的期待也强烈。这种期待为企业的经营带来了积极的效应，并且减弱了人与人之间的“差距感”。曾有一时，“一亿总中产”成为日本国民们的共同感觉。

然而，通货紧缩长期持续，并由此开始对负担的分担（负的分配）进行讨论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也不断减弱，于是差距感就显得比实际差距来得更加强烈。

另外，探讨差距的政治家们除了上述的“一票中的不平等”外，政治家自身的世袭性也是一个问题。无论国家政治还是地方政治都逐渐显现“家业化”“世袭化”的趋势。而其将导致新的人才无法参与进来的结果。小选举区制度中，世袭政治家是有优势的，这将促使世袭化越发严重。而为在小选举区当选，政治家往往会优先考虑解决当地居民的问题，而非在国策的层面上考虑政策问题。结果将是，重视分配的政治倾向越来越强烈。

关于分配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的议论，在民主主义政治下作为重要的主题还将继续受到关注。但是，在通货紧缩已持续十几年的日本，关注经济成长的政治和政策更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探讨。

不重视经济成长而偏重分配的政治中最为典型的产业就是农业。以保护为名义进行单方面拨款，这不能叫做产业政策，只能叫做社会政策。而其结果就是，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缺乏竞争力和增长能力，农业中的企业家精神由于这种政策（政治）而衰退。农业生产总额从 1980 年代中期的顶峰 12 兆日元，滑落至 2009 年的 8 兆日元。8 兆日元，仅相当于一家大企业的营业额而已。

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，日本的贫富差距问题与皮克提描述的世界并不相同。

[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。]

小岛 明

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、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、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参议
